

范晔与《后汉书》

□ 陈晓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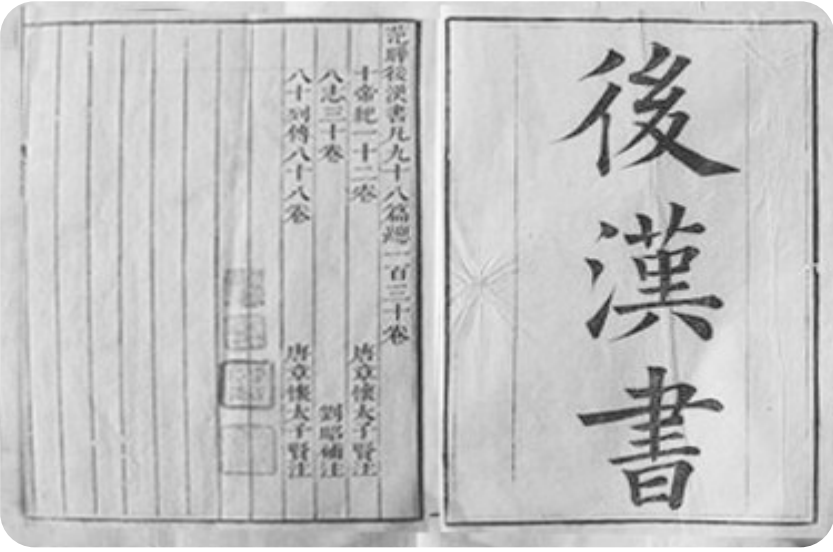
《后汉书》的卓异之处

《后汉书》无疑是文穷而后工者。它是范晔被贬宣城太守期间完成的；它以《东观汉记》为基本史料依据，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，合众家之长而超越众家，到唐代，取代《东观汉记》，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并称“三史”。而诸家《后汉书》，除袁宏《后汉纪》得以流传下来外，其余都已散佚。由此可见《后汉书》成就斐然。的确，它体大思精，创新良多。所创《党锢》《宦者》《文苑》《独行》《逸民》《方术》《列女》等传，为后来诸史之典范，莫能刊削。所写诸序与论赞，继承了《国语》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一语褒贬的风格。所写纪传，文辞高妙华丽，含蓄凝练，笔势纵横，人物刻画逼真，加以其中收录了大量政论、辞赋，使之兼具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。它评判是非，表彰刚正，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，细致刻画人物，文采飞扬，笔锋犀利，汪洋恣肆，确如范晔自称“天下之奇作”，诸如“诚跨众氏”“博采众书”“颇有奇工”等赞誉也实不为过。

其作者范晔自视甚高，“常耻作文士”，这和后人“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也”之旨一脉相通。他讲求的是经世致用，所以要求文以载道，“以意为主，以文传意”，反对“事尽于形，情急于藻，义牵其旨，韵移其意”的形式主义，所以他尽付思绪于《后汉书》，宝爱自己的《后汉书》，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作，“精意深旨”“体大而思精”。离别人世之前，专门写文申明作《后汉书》的主旨，为《后汉书》张本，希冀世人莫辜负自己的《后汉书》。这时，他为了《后汉书》也终于道出了贬低自己之语——“称情狂言”，既是平生写照，也是自己终于意识到自己往日不与世合作的代价。倘若还是在往日，他断不会如此折节低头。但为了精神传世，他实用心良苦。

范晔身处的时代

范晔实在是个矛盾体。他身为天子贵胄却是其中卓异者。所以，他的《后汉书》没有无所作为的达官显贵的立足之地，却有前史所未有的独行逸民彰显之色，并且独行与忠君同列。这与司马迁编著思想一脉相通。而这些独行逸民一介之夫其实就是他的另一写照，只是他富贵的出身与才华，使他不可能绝然独行，完全成为逸



民，故而他行事充满矛盾。一方面从容于富贵，一方面又立异之。清高孤傲，恃才傲物，爱憎分明，不肯苟合。对个人来说，范晔无疑是悲剧的。不过，正因为个体的悲剧，才促就了伟大的作品。

范晔的悲剧起于自身，而时代则是酝酿他悲剧的温床。他生活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。这是一个老庄再生再造再实践的时代。这个时代，越名教任自然，老庄的怡情任性、无为逍遥被时人阐释并演绎到极致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一切不但无可厚非，而且甚可嘉赞，并且非有品行高性不能为之，亦即非世俗之人所能达至。连索的临川王刘义庆也是这大军的友情支持者。正是由他出面组织编纂了一部揭示这个时代众生相的《世说新语》，才使我们得以近距离感知到他们。这是一个看重门第的时代，一个纷乱的时代。然而，当他们逍遥自游，恣意人生，精心避祸时，罗网也在悄然向他们张开。

这个时代，可以抛去的是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不可抛去的是内心的高贵，所以他们是矛盾的，这个矛盾把他们推向了绝境。范晔就是这时代诸多矛盾集于一身的代表，而直接把他推到绝地的是那个展示时代众生相的刘义庆家族。

范晔的个人悲剧

范晔出身豪门，才华横溢，皇帝对其很是看重，如果不是他狂狷不羁，恃才生骄，本可安享清贵，恣情任性一生。

范晔家自高祖以来三代显宦，他的家庭出身是无可挑剔的。然而，遗

憾的是，范晔是小妾所生，生时还被砖头碰伤了头，因而得了小名“砖”。在那个重门第的时代，这无疑宣告了范晔低同类人一等，即使他被过继给从伯父，后来袭封武兴县五等侯，由此获得了与嫡子一样的地位，但终究改变不了他小妾所生的事实，逃不脱庶出之痛，也无法逃脱时代对他的歧视。因此，他所继承到的只是家族的优秀基因，即使他从小就好学，博涉经史，才高志大，但也无济于家族正统血脉合法继承者的认可。所以他的心里是有阴影的，而他“长不满七尺，肥黑，秃眉须”，更加剧了他内心的阴影。

至于他究竟是怎样的人？其兄认为他近利，终破我家。文帝认为他意难厌满。出卖他的徐湛之认为他“倾动险忌，富贵情深”。他真的如以上人等所讲倾慕权贵，急功近利，贪得无厌吗？先观其文，《后汉书》歌颂仗义执节者，赞美舍生取义者，显然从其文很难得出以上结论。再观其行，倘若他近利，那么他完全可以谄媚宋文帝，他“善弹琵琶”，文帝想听他弹琵琶，多次暗示，他都故意装没有听懂，或者干脆就毫不客气拒绝。仅有一次还是文帝为了听他弹琵琶，索性不要帝王之尊了，亲自唱歌，点名范晔要求其为之伴奏，他无法拒绝这合情合理的要求，才勉而为之，但当文帝屈尊唱毕他就停止弹奏了。用他的话来讲，他不是优伶，为什么要为文帝弹琵琶。其实，文帝并没有把他当优伶，而是欣赏他的音乐才能，想一听为快而已，但他偏偏如此理解文帝美意。是自卑，还是狂放不羁，还是恃才傲物？想必三者都有。他聪慧过人，竟然误解文帝；他才华横溢，借物咏物，讽刺了他鄙视的同僚沈演

之、徐湛之等，快意了自己，却对上司有失尊重，也缺乏宽容。他自小就有的心理阴影，加之成长环境的影响，促成了他的狂放不羁与乖张，使他那颗高傲的头，不肯低下俯就文帝。空有满腹才华，却不懂君王恩威，终究不能自保。

他确实乖张，还颇难理解。彭城王母亲去世，他邀约一帮人饮酒作乐被贬。正当君臣相和，位极人臣之际，却被坐实助彭城王造反。此事从他的动机到实际表现都值得怀疑。如他诉说心声的《后汉书》所反映的一样，他行事未免乖张，但对朝廷是忠贞的。况且，如他果真造反，宋文帝岂肯放过他的家族。

还是长于考据的清人头脑清醒，不囿于成见，敢于疑古。清人王鸣盛首为范晔鸣冤，他认为《宋书》“全据当时锻炼之词书之”，不足为据。随后，李慈铭、陈澧、傅维森等踵而为范晔平反。范晔被坐实谋反，如前所述，源于其性格。对于首谋孔融先，范晔“轻其小儿，不以经意”，知情不报，而徐湛之等出于个人恩怨捏造了“首谋”之罪。范晔是皇族矛盾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《后汉书》有幸得以流传后世

上刑场时，范晔可惜的是自己的好头颅。叹息从此人间空谷绝响，不能再读到从他头颅指示发出的鬼斧神工的妙笔，听不到他指点江山的妙语了。宋文帝是他的知音，范晔生前，文帝一再包容他。直到杀掉范晔后，也没有忘却他智识满满的头颅。范晔死后，文帝却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即派人去取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并加以保护。在中国古代，帝王的臧否，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，而且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没有文帝的保护，《后汉书》肯定无法流传下来。当时与他合撰《礼乐志》《舆服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天文志》《州郡志》等五志的谢俨，就因怕受牵连，毁掉了手中的志稿。于此，文帝无疑也是清醒的。对范晔本人，他不得不杀，但他可以尽量减少由此而造成的损失，那就是保护范晔留下的精神产品。所以，他保护了范晔的《后汉书》，相当于延续了范晔的另一生命。



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研究新问题、攻关新难题、聚焦新课题，进一步健全全员育人、全过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，在助力师生坚定理想信念、厚植爱国情怀、加强品德修养、增长知识见识、培养奋斗精神、提高综合素质等方面加大探索，在立德树人方面贡献更多智慧和经验，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出新贡献。

（作者系中国共产党党委书记）

阶段这个基本国情。我们必须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，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，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蹄疾步稳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向前发展。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，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，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。

运用历史思维，就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。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思维的大敌。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，历史的联系不可能割断，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，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，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，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。”对于历史虚无主义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，听之任之，必须擦亮眼睛，作坚决斗争，捍卫好我们的历史。

丁公是项羽手下的将领，他还是季布的舅舅。刘邦彭城大败之时，丁公奉命追击，越追越近，眼看刘邦就要走投无路，刘邦便回头对丁公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：“两贤岂相厄哉！”好汉何苦为难好汉？丁公一听，居然在两军厮杀的战场上，止步不追了。他当即领兵撤回，等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。为什么刘邦一句话丁公就放人？这是刘邦的江湖阅历的本能反应。江湖上常讲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仇家多堵墙。刘邦被逼到绝境，只能赌丁公也许认同江湖规则，说出了这句话，果然丁公网开一面，把刘邦给放了。

丁公是季布的舅舅，季布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侠客一流的人物。一诺千金的典故说的就是季布。季布的弟弟名字叫季心，也是一位侠客人物。当时关中流传一个说法，叫做“季心以勇，布以诺，著闻关中”。意思是当时关中人都知道季心以勇猛著称，季布以守信用闻名。丁公作为季氏兄弟的舅舅，应该也是深谙江湖之道的人物，所以他当即领兵撤回，等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。

等到项羽灭亡，刘邦要开始封了，丁公来谒见刘邦。刘邦怎么对待丁公？他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，说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也。”遂斩之，并且特别强调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“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”！

王夫之反对

对刘邦的做法，大学者王夫之很不赞成，他认为刘邦杀丁公是错的。王夫之认为，以大义征服天下的人，用的仅仅是诚心而已，心中不愿而勉强去做，以标榜其名声，于是天下人就会认为义与人心相悖且不和顺于理。试想，当汉高祖处境窘迫之时，难道果真会认为丁公应当处死因而日后一定要杀死他吗？当他诛杀丁公之日，难道又果真能够忘记当年丁公曾解救过自己的危难，而不认为这是丁公对自己的恩德吗？

王夫之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，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，矫焉自诬以收其利。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圆也乎？”王夫之提出的问题是，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，做人臣如果不忠则必受惩罚，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，如果这样，那么“义”不就成了伤害“仁”的大斧和导致私利的诱饵吗？所以，刘邦赦免季布的罪过并予以重用，是很好的，足以激励臣子忠君报国，无有二心。至于丁公，废而不用就可以了；杀了他，则是引导天下人忘恩负义。恩情既然都可以忘记了，如果不是刑戮紧随其后，那么浩荡无极的君父之恩，为什么不可以忘记呢？

王夫之是大学者、思想家、伦理学家，他站在伦理学的高度提出，要用大义收服人心，要将心比心，用诚心换诚心，不能把大义功利化。所以，王夫之强调，义，有天下的大义，也有自己心中的精义。大义必须恪守，精义不能功利化。否则就是以恶导善，那人可就贻害无穷了。

司马光赞成

对刘邦斩杀丁公之举，历史上有另一派声音，认为刘邦做得对，其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。司马光是史学家，更是政治家。他站在政治家的立场看问题，认为一个王朝要想长治久安，一定要讲政治操守。

他专门写了一篇“臣光曰”评论此事。司马光认为，汉高祖刘邦从丰邑、沛县起兵以来，网罗强横有势力的人，招纳逃亡反叛的人，也已经是相当多了。待到登上帝位，唯独丁公遭受杀戮，这是为什么？“夫进取之与守成，其势不同。”当群雄并起争相取胜的时候，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，谁来投奔就接受谁，本来就该如此。但是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待到贵为天子，四海之内无不臣服时，这么做就不对了。司马光接下来的这番话就非常政治水平，他说：“苟不明礼义以示之，使为臣者，人怀贰心以微大利，则国家其能久安乎！是故断以大义，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；而怀私结怨者，虽至于死，犹以义不与

引起司马光和王夫之分歧的公案

□ 丁万明

也。”如果不明确礼义以显示给人，致使身为臣子的人，人人怀有二心以图求取厚利，那么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？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，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，怀揣个人目的布施恩惠给人的人，尽管他救过自己的命，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容。司马光认为，似此杀一人而使千万人畏惧，这不就是深谋远虑吗。汉高祖的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400多年，这就是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。

刘邦为何要这样做

刘邦斩杀丁公，引来争鸣，司马光和王夫之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学者，从学者的角度看问题，孰是孰非，各有各的理由。但刘邦斩杀丁公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。

刘邦为什么要杀丁公，出人意料吗？在当时来说，有点出人意料，但却又在情理之中。为什么？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。被丁公追杀时的刘邦还身处江湖，而如今已经身居庙堂，角色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不问是非只讲义气；庙堂有庙堂的法则，要讲政治，讲操守。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讲，正所谓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

司马光和王夫之分歧的关键在于站位不同。司马光作为政治家，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问题，他看到，正是因为刘邦强调为人臣者要以新的政治立场看问题，强化了政治同盟意识，这才有了此后“非刘姓而为天下共击之”的白马之盟，这才有了诸吕之乱之后的周勃安刘、元勋功臣推举皇帝之举。东汉时期党锢之祸、外戚专权、宦官随意废立皇帝的事多有发生，但极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叛朝廷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刘备作为刘氏宗亲已经沦落到卖草鞋的地步，但凭着“大汉皇叔”的身份，仍然有号召力，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。实力强大、特立独行的曹操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江山社稷，但仍然不敢公然称帝，说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”。这证明了刘邦的决策是对的。



（上接1版头条）

围绕立德树人中心环节，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发挥好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这“两个引领”作用。从政治引领角度讲，就是要通过高校党组织建设，始终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正确政治方向，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，确保高校师生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从价值引领角度讲，就

（上接1版二条）

运用历史思维，要贯通过去现在未来，把握现在，走向未来

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运用历史思维，就要明了历史的大逻辑、发展的大潮流。“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走向何方？”这是历史思维所要把握和回答的根本问题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，重视历史、研究历史、借鉴历史，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、把握今天、开创明天的智慧。读懂历史的大逻辑，需要有拨云见日的功夫，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，看大势、谋大局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。只有把握世界历史，才可以看清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是历史大势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世界

经济的大海，你要还是不要，都在那儿，是回避不了的。唯有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规律、认清大势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，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，才是顺应大势的正确抉择。只有把握历史，才能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，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道路奋勇前进。只有读懂中华民族近现代史，才能认清从沉沦到奋起、由苦难到辉煌的历史，才会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厚根基，并为之而不懈奋斗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运用历史思维，治国理政就要以历史为镜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治理国家和社会，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，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。”早在1944年毛泽东高度评价郭沫若撰写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要求在解放区重印

这篇文章，目的是“叫同志们引为鉴戒，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”。今天，新时代要有新作为，无论是治国理政、全面深化改革，还是推进反腐败斗争，抑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，都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启迪。对古代的经验，我们要本着“择其善者而从之、其不善者而改之”的科学态度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。

运用历史思维，就要不忘初心，坚定历史定力。在风险考验面前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；保持定力，才能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。我们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，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，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，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只有正确把握变与不变，我们才能既顺势而为，又保持定力。新的历史方位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